

现代出版学

师曾志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摇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现代出版学 师曾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2

摇(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摇ISBN 7-301-10582-0

摇I 摇现...摇II 师曾志著摇III 出版工作 摇IV 出版学 摇V 201.1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125888号

摇书 名:现代出版学

摇著作责任者:师曾志著

摇责任编辑:周丽锦 胡利国

摇标准书号:ISBN 7-301-10582-0

摇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摇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52号 摇邮 政 编 号:100871

摇网 址:<http://www.pup.pku.edu.cn>

摇电 话:邮购部 010-62750172 摇发行部 010-62750173 摇编辑部 010-62750174
出版部 010-62750175

摇电子信箱:zhangyue@pup.pku.edu.cn

摇印 刷 者:

摇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185毫米×260毫米 摇印 张:16.5 摇字 数:300千字

2005年 12月第 1版 摇2005年 12月第 1次印刷

摇定 价:28.00元

摇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摇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摇举报电话:010-62750175 摇电子邮箱:zhangyue@pup.pku.edu.cn

目 录

第 一 编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节 我国出版历史概述	3
第二节 现代出版学的形成	15
第二章 现代出版学基础理论	24
第一节 出版的概念	24
第二节 影响出版概念变化的因素	29
第三节 出版的性质	30
第四节 出版的功能	32
第五节 出版学研究的对象	35
第六节 出版学的研究内容	38
第三章 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与原则	40
第一节 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	40
第二节 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	42
第三节 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	43
第四节 出版队伍的建设	45
第五节 出版工作者的基本修养与基本素质	49

第 二 编

第四章 出版与传播	53
第一节 出版传播的要素	54
第二节 出版传播的过程模式	58
第三节 出版传播效果	65

第四节	出版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71
第五节	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74
第五章	编辑与出版	76
第一节	编辑的概念与性质	76
第二节	编辑的主要类型	80
第三节	编辑角色与编辑模式	82
第四节	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88
第五节	影响编辑工作开展的因素	91
第六章	出版物及其构成	94
第一节	出版物的概念	94
第二节	出版物载体的演变	97
第三节	出版物的标识	100
第四节	出版物的基本结构	107
第五节	出版物的类型	109
第六节	出版物形态的变化	116
第七节	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变革	121
第七章	出版管理制度与出版形式	125
第一节	出版管理制度及思想理论基础	125
第二节	出版行政管理	133
第三节	出版机构的设立	136
第四节	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	140
第五节	出版形式及出版单位的类型	143
第六节	出版专业分工与出版品牌	147

第 三 编

第八章	选题策划及组稿	153
第一节	选题与选题策划	153
第二节	选题的原则与选题计划	157
第三节	选题策划的依据	164
第四节	选题策划的内容和方式	168
第五节	组稿工作	170

第六节 约稿方式与程序	176
第九章 审稿及编辑加工	179
第一节 审稿的概念与作用	179
第二节 审稿方式和步骤	181
第三节 三审制及存在的问题	185
第四节 审稿的具体内容和影响因素	188
第五节 编辑加工及其方法	191
第六节 编辑加工的步骤及技巧	194
第十章 出版的相关业务	200
第一节 出版与著作权	200
第二节 出版合同及其签订	206
第三节 出版侵权与版权管理	212
第四节 发稿及出版物校对	218
第五节 重印与再版	221
第六节 出版物质量管理	224
第七节 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	227
第十一章 出版物装帧设计	230
第一节 装帧设计的内容	230
第二节 装帧设计的设计思想	231
第三节 装帧设计的原则与特点	233
第四节 出版物结构和装订样式设计	237
第五节 出版物的材料设计	241
第六节 出版物的美术设计	243
第七节 出版物的开本设计	245
第八节 出版物的版式设计	249
第十二章 出版物成本及定价	255
第一节 出版物成本概述	255
第二节 出版物成本构成	257
第三节 出版物成本控制	260
第四节 出版物成本核算中的重要概念	262
第五节 出版企业纳税管理	264
第六节 影响出版物定价的因素	267

第七节 出版物定价模式与基本策略·····	270
第十三章 出版物市场营销·····	276
第一节 出版物市场营销概念·····	276
第二节 出版物市场营销组合·····	278
第三节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280
第四节 出版物市场划分及特征·····	283
第五节 出版物分销渠道及购销方式·····	286
第六节 出版物宣传促销·····	290
第七节 出版物市场管理·····	296
第八节 出版物市场的作用与竞争·····	299
结 语·····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09

第摇一摇编

第一章 摇绪摇摇论

第一节 我国出版历史概述

自人类发明了文字、纸以及其他可以用来广泛传播的介质以来,出版就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信息知识传播、人类文明传承不可或缺的手段。

我国出版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这在学术界并无定论,从总体上看,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认识:

①出版活动始于殷商时期,以甲骨文书为标志;

②始于东汉时期纸张的发明,以纸写本为标志;

③始于隋唐之际,以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为标志。

持第一种认识的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出现了用文字将一定内容记录在一定载体上的活动,出版活动就起源于这个时期。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有多次古代甲骨文书的考古发现,尤其以1936年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最为闻名。然而,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是在盘庚迁殷之后改称殷的,这也就是说,在盘庚之前就已经有文献存在了。由于实物和史料记载的匮乏,学术界很难判断文献真正起源于何时。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关于文献的起源的认识也许还会有所改变。因此,这种认识存在不足之处。

第二种和第三种认识分别强调了出版活动中纸媒介和印刷术的重要性,认为纸张和印刷术是构成出版的必要条件。根据《后汉书》记载,纸是公元105年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的,但现代考古先后发现的“灞桥纸”、“扶风纸”等经证明都早在蔡伦之前,至少在西汉时期纸就用于书写了。隋唐之际印刷术的发明是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鉴于“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古人发明了纸,并将之作为文献的载体。印刷术的发明,为以纸为载体的文献“化身千万”提供了基础。然而,纸发明前,诸如石头、龟甲、兽骨、铜器、竹木、丝织品等就曾作为文字的载体,简册和帛书已被中国

书史视为最早的书籍。计算机排版、激光照排和数字出版物制作等技术的产生,以光、电、磁等介质为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的出现,致使纸与印刷术不再是出版的必要构件。因此,这两种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出版活动开展的实际来看,纸与印刷术属于出版的范畴,但不是出版活动的必要要素。

从以上学术界对出版活动起源的三种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分别强调了出版活动的某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不起不断发展的出版实践的检验。究其原因,这都是因为受时代限制,对出版概念的理解有所偏差而造成的。

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出版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出版活动在具备了文字、图画等信息符号,记录和制作信息符号的介质,记录制作的手段并且信息能进行复制和广泛传播时就开始了。古代西南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其起源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但“这两种最古老的文字,在距今两千年前后都已消亡了。而我国的文字,由甲骨文而金文,而小篆、隶书、楷书,前后递嬗,一脉相承,未曾间断”^①。世界上作为书面语文字且四千多年不中断的只有汉字。这为我国出版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纸、出版技术以及文献典籍的保存、管理、写作制度等为文化典籍的制作、传播等提供了基本保证。纸发明之前,先秦时就已有文献典籍问世,但因为载体材料的局限,不利于典籍的复制和传播。纸被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成为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出现之前最佳的出版物载体,为文献典籍的大量复制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简而言之,出版构成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尽相同,它们代表了出版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水平。比如在我国,作为出版物载体的曾有甲骨、竹木、缣帛、纸、胶片、磁带、磁盘、光盘等;复制的手段从刻写、抄写到印刷、屏幕显示、下载、扫描、复印、打印等;传播上从书肆到赛博空间(网络空间)^②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然而,推进近现代出版业发展的机械印刷技术,却基本上是由德国人约翰尼斯·谷登堡在15世纪中叶完成的。机械印刷技术的发明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晚了四百多年。谷登堡在铅活字印刷技术上的改进,使印刷进入了机械化生产阶段,由此,他被世界上许多地方尊称为“印刷之父”。这证明了古代印刷术发明后,其改进和发展是有限的,同时也说明出版活动本身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深刻影响。

① 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② 1845年,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其著名的科幻三部曲小说里发明了“网络空间”一词。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典籍多由统治者掌管,即所谓的“学术在官”,这对文化传播有很大的限制。直到战国时期,史官制度崩溃,私学兴盛,“学术下移”,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格局时,我国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著述。随后为了使这些著述能够流传久远,又出现了手抄复制本。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很多人专门从事手抄复制典籍的工作,如《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家贫,常为官府佣书以供养”。历代官府也十分重视典籍的抄写复制工作,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北朝时除管理国家藏书的专职人员“令史”外,还设立了“弟子”和“正字”人员,前者是专门的抄书人员,后者是校对人员。手抄复制典籍工作的开展,为人们读书、藏书提供了便利,而读书和藏书地开展又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

公元7世纪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古代出版技术发展的又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雕本肇于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说明雕版印刷术在隋代就已开始应用,是东汉造纸术之后的又一大发明,也为出版物的化身千万提供了进一步的技术基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随着这项技术不断地对外传播,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古代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书肆”的出现。“书肆”又称“书坊”等,是专门抄书、交换和买卖图书典籍的地方。据史料记载,它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艺文类聚》引《三辅黄图》记载:“(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9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相予买卖,雍雍揖让,侃侃闾闾。”西汉扬雄《法言·吾子》中也记载:“好书,而不要仲尼,书肆也。”书肆的出现,使典籍得到广泛传播和利用,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书肆中从事图书贸易的书贩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显现出了出版获利的性质,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上看,古代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为出版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提,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出版物广泛传播的要求,构成了古代的出版活动。古代出版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出版管理制度上以皇权为主的至高无上性。古代的出版管理制度尚没有形成十分严密的管理体系。从表面上看,封建朝廷采取的是事前审查和事后追究相结合的管理方式,但与近现代国外出版管理中的预防和追惩制度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以国家大法保护出版是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在一套相对独立、合理、稳定的出版法律、法规下实施,而前者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和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法律、法规等,它是由统治者根据传统和“皇权至上”的理念对出版业

进行管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强制性。如史料记载,五代十国时期经书只能由官府指定的部门出版,不准民间私自翻印,至于民间翻印其他方面的典籍却没有具体规定。《宋会要辑稿》曾记载有:“不得私印书籍,‘其他书籍欲雕印,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褻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郡县国子监觉察’”。宋代民间出版的书籍甚至只要向政府申请即可得到一定的版权保护。^①可见,历代各朝统治者在出版业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制度。

■形成以官刻为主导、坊刻与私刻并存的出版体系。古代出版业形成了官刻、坊刻与私刻三大系统,体现出以官刻为主导、坊刻与私刻并存的特点,这与出版管理中“皇权至上”的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官刻是指政府各级机构从事的出版活动,其刻书内容主要是正经正史,兼及字书、韵书、医书、农书等。它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编校典籍。早期主要是进行典籍编校,目录编制。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官府书籍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校订,由官府或地方刻印。有些也允许民间照其版片印书,成为社会印书的标准版本。二是禁毁典籍。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政权后,就认识到文化学术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因此,作为文化学术的承载载体——文化典籍,其命运便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从秦始皇的“焚书”到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寓禁于征”,形成出版史中禁毁书籍的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开展了禁书活动,对典籍进行了改窜及焚毁,以巩固其统治。各个时期禁毁典籍的内容由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所决定,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禁毁典籍往往与著作者家毁人亡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坊刻是以获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其质量参差不齐,但历代都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控制。坊刻主要为书坊、书肆、书棚、书籍铺等刻书,关于儿童识字启蒙、日历、科考、文学等方面的书籍较多。坊刻以赢利为目的,对社会需要反应快,制作上也较早采用雕版印刷术,推动着出版业向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私刻主要指私家、家塾、寺院等刻书,内容主要为正经、正史、诸子、文集等。私刻一般质量较高,销售不是其主要目的。

■出版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封建统治者对思想文化事业的管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典籍的收藏、保存、校正及编纂等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存典籍和条别学术源流,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工作又具体体现在编制目录与大规

^① 参见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04页。

模编书、刻书中,并由此产生了古代官修目录与官刻典籍两大系统。它们反映出古代出版活动主要被官方统治的特点,强调其政治性、思想性及教化性。出版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是其统治意志、思想、观念等的体现,因此古代典籍具有注重整理保存而不注重传播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为古代出版工作中十分强调编辑与校雠的作用。编辑不仅对文字、内容进行厘正,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言论上进行鉴别与把关,突出典籍在政治、思想及教化中的作用。

灑出版活动中强调编辑的作用与编著合一。这与古代典籍的创作、形态、制作技术、传播方式及出版制度等有很密切的关系。先秦诸子著述不是以个人写作为主,而是在讲学中由学生和弟子记录。在这些记录中,往往加上了学生和弟子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学生和弟子又进行传授,再由他们的学生和弟子记录下来,几经传讲、传抄,最后集合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心得、体会编成一部书,如《论语》就是这样编纂成书的。再如孔子是在对史料进行选择、删减、编排的基础上整理完成《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如《诗》是在原来彘四余篇基础上形成的,最后仅收录彘三篇。在编辑方法上,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等编辑原则。孔子的编辑思想主要体现在严格取舍、尊重和保持史料文献的原有内容等方面,所以说孔子整理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闻,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上说是创作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①。孔子的这些编辑原则,基本上被后世所遵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删定六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儒家的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典籍。

古代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编著合一的特点。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 104 年)因见“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到河平三年(公元前 28 年)时,“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书,靡不毕集”^②。刘向等人校理群籍,最后写定的正本实际上是在不同版本的基础上编辑的一本新书,从内容到篇章顺序、书名等都是编辑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编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著述范畴,与我们今天所指的编辑工作有一定差别,它不是作为一种职业在社会上存在。另外,古代官方编辑出版活动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与现代编辑工作有着根本的区别。

灑注重编辑出版活动的学术性。由于古代编辑与著述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强调文以载道的思想,因此,官方编辑活动的开展,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别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11 册,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04 页。

② 参见《汉书·艺文志》。

录》、《七略》到清代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都是由官方任命鸿学大儒负责的。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编目开创了古代整理典籍时对典籍进行评论和对学术源流、流派及学术兴衰进行总结和论述的优良传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有着很强的学术性。这种优良传统被历代继承并在清代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发展到极致。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对古代目录学的最好概括,也是对古代编辑活动的最好诠释。

近代出版编辑工作与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典籍的流传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主要靠人工抄写,不同著作往往有很多的手抄本,如《论语》就曾有三种不同系统的手抄本,《列子》有五种不同的手抄本。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手抄本在传抄和流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错误和遗漏,因此,典籍在传播前必须进行整理、加工。如汉成帝命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校理群籍,他们校书编目的内容主要包括: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文字,确定书名,写定正本和撰写叙录,最后编辑成《别录》、《七略》。叙录实际上是每本书的内容提要。它包括了目录、校勘及版本等方面的内容,为目录学、校勘学及版本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近代出版业以清政府官书局的设立和外国传教士的中文出版活动为开端。这时期的出版业与古代相比,尽管还延续着官刻、坊刻和私刻三大出版系统,但在运行机制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在中央设立刻书机构,但清同治年间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兴儒教,“正人心”,“维世道”,在曾国藩倡导下创建了江南书局(后改为金陵书局),从此以后地方设立官书局蓬勃发展起来。官书局始于同治,盛于光绪,陆续停办于民国,这主要与清末皇权统治日渐衰微有密切的关系。这时期社会剧烈的变革,也为民间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代民间出版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传教士、封建官僚以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等纷纷设立出版机构。外国传教士设立出版机构进行中文出版活动是为了达到“文字播道”的根本目的。早在 1815 年,伦敦布道会就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悦者译,配书译,配书译,配书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近代中文刊物。1827 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文月刊,它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刊物。1842 年,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该书馆还出版了《六合丛谈》月刊,它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京师同文馆的西书翻译活动拉开了洋务派翻译出版西方书籍的序幕,后来

各地成立的翻译馆、译书局等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随着西方机械设备和技术的传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出版物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它们为中国近现代民营出版企业的日趋成熟奠定了技术和人才基础。

1897年创办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它是近现代最重要和最具规模的民营出版企业,是最早采用股份制经营管理的出版企业。很多学者认为,“书报业在近代一度是统称的,只有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现后,出版业才逐渐单独出来”^①,这说明商务印书馆的创立和发展标志着现代出版业的成熟。1997年,在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将1897年定名为“中国现代出版年”。

晚清时期,由于清朝统治内外部矛盾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进行着深刻的变革。商务印书馆见证了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同时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它以时代需要为己任,在废科举、兴学堂、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推进新文化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教科书、翻译书、古籍、学术文化著作,在普及教育、整理古籍、介绍西学、传播学术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闻出版的日益法制化也是近现代新闻出版业的一大特点。清末民国时期,我国新闻出版方面的法规主要有1874年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898年的《大清报律》、1908年的《钦定报律》(刊布时,有些报刊又称之为《修正报律》、《修订报律》等)、1909年的《出版法》和《报纸条例》、1914年的《出版法》、1915年的《出版法施行细则》、1917年的《修正出版法》等。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主要取法于日本,把新闻法与出版法分别制订,互相独立存在。如1909年既有《出版法》,又有《报纸条例》,《出版法》的内容不包括对报刊的管理。1914年的《出版法》和1917年的《修正出版法》则包括“报纸及杂志”和“书籍及其他出版品”两大类。

随着出版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出版机构中开始专门设立编辑部门,出现了专职编辑,编辑成为一种社会职业。所有这些带动了出版业的发展。一些出版专业类杂志也纷纷出现,为出版科学研究提供了园地。据创刊于1904年10月的《中国出版月刊》的调查显示,1904年全国出版类杂志有《中国出版月刊》、《中华书局图书月报》、《中华新书月报》、《中医出版界》、《佛学出版界》、《出版消息》、《现代出版界》等七种,出版界和学术界开始对这一阶段出版工作

^①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中的诸如出版事业、出版自由、出版法、著作权、图书出版、图书定价、出版社、出版物、各门类图书的出版、专业出版、出版与文化、出版家等专题进行研究。出版编辑工作原理、方法、编辑的作用及社会地位、编辑人员的素质要求等都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据邓咏秋编的《二十世纪图书出版业研究论文索引》^①,从 1919 年到 1949 年初,报刊和论文集中共收集图书出版业研究论文 1500 多篇,其中从 1919 年到 1949 年 10 月就有 1000 多篇。发表的论文如陶涤亚 1923 年 10 月发表在《汗血月刊》第 5 卷 1 期上的《出版检查制度的研究》、剑农 1923 年 10 月发表在《太平洋》第 10 卷 1 期上的《宪法上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傅逸生 1923 年 10 月发表在《现代》远卷 1 期上的《中国出版界到何处去》、李伯嘉 1923 年 10 月发表在《大厦》第 1 卷 1 期上的《十年来中国出版事业》、汪集庭 1923 年 10 月发表在《妇女杂志》第 1 卷 1 期上的《女青年与出版物之关系》、朱松 1923 年 10 月发表在《医界春秋》第 1 卷 1 期上的《中医书出版的检阅和期望》、1923 年 10 月发表在《教育与职业》第 1 卷 1 期上的《出版业经营家王云五传略》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人民出版社^②成立,开创了人民出版业的先河。1949 年 10 月,新华书局(当年 10 月改称新华书店)在延安成立,到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之前,新华书店在各地的分店已有 100 多处,印刷厂 100 处,职工近万人。^③全国解放前,新华书店是兼营出版、印刷和发行的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构成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首先是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前提下,建立起了一系列组织机构和一整套出版基本方针与政策,为出版事业开展的方向和出版体制的建设提供了保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组建了出版委员会,并于同年 10 月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可见,我国政府在建国初期就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解放初期的出版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发展解放区进步出版力量、团结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和进步出版力量、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初期出版事业的发展与新华书店的发展和改组

① 参阅王余光编著:《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4—105 页。

②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由党的宣传主任李达负责,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不同于今天的人民出版社。

③ 参见于友先:《新中国出版 40 年》,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有密切关系。鉴于各地新华书店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出版总署于1954年猿月猿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为新华书店的统一管理奠定了基础。1954年怨月,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强调出版事业不能单纯以赢利为目的。在这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决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关于改进和发展书刊发行工作的决议》、《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和《关于改进书刊印刷业的决议》等五项决议,它们基本确立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业的方针、任务、体制结构及发展方向。

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新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实行的都是既担负编辑出版任务,又自办印刷、发行的“三位一体”的出版管理模式。1954年猿月猿日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明确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各总分店“三位一体”的出版管理模式。然而,这种管理体制很快就进行了调整。1954年 苑月 圆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指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该逐步实行科学分工。自1954年以后,开始逐步实行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与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的方针。

出版专业化管理模式在出版总署1954年发布的《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中正式确立下来。它规定: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首先实行分工与专业化,全国各级新华书店兼营出版印刷业务者,即着手划分为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和发行企业三个独立企业单位,即各级新华书店原有的编辑和出版单位改组为中央或地方人民出版社,原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厂务部及所属京津两地印刷厂,改为单独的企业单位,设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统一管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改组为新华书店总店,担负图书总经售、总批发及零售等任务。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和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直属出版总署。

根据《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中“公私出版业均应争取条件,逐步实行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与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的方针”的精神,国家加强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至1956年,我国私营出版业按照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开始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基本完成。私营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联营书店等的发行机构于1954年 员月 员日在北京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各地成立了分公司,